

全球女性主义研究—中国

2004年3月12日

叙述者：李慧英 中央党校社会学系教授

访谈者：张健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

地点：中央党校家属院 李慧英家

录音转写：王平 陈琛

张健(以下简称张):今天是很高兴,咱们继续进行这个口述史的这个课题。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从中向您学到您的这个成长的过程,这个女性主义在您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哪些影响,您个人是怎样认为的,女性主义的概念哪,和它的这种行动,和在中国的发展。

李慧英(以下简称李):就是,我,我拿到你这个访谈提纲啊,我一边看一边想,我说,好像这些年来的感觉呢,就一直是在想着怎么搞课题,怎么样搞培训。就在这些方面在做,但是很少反过来想,就是说,哟,我什么时候我去接触到,甚至就是喜欢上女性主义这样的思潮,而且呢,就是从...为什么会对它发生兴趣,而且呢,到底对于我的生活呀,包括对于自己的研究啊,都有哪些影响,过去好像还很少这样去想。我觉得这一次呢,就是说等于给我一个机会,噢,重新去梳理自己,过去有一些...到底为什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为什么会对它有一种情有独钟。所以我就是想到的,谈到的生活背景啊,包括成长背景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追溯到个人的成长背景啊,应该说是那种,我就是在一个无性化的年代里面长大的。我觉得和

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现在讲女性味十足啊，这样的一种背景，应该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张：您所讲的无性化年代，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无性化的年代。

李：应该这样说吧，就是中国那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呀，那时候呢，就是对男女的这种性别差异呀，很少去关注，而特别常常强调的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就是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要...也能做到。所以呢，它常常用男同志做一个衡量女同志的一个标志。常常讲男同志、女同志，那么作为一种标准，就是说不会强调你的那种性别上的差异，而是让你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同一个标准，甚至男性标准来去要求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女性的很多生理上的差异实际上是给忽略掉了。所以在这个年代，男和女在很多很多方面，包括穿衣服，红...蓝的，绿的，灰的，在颜色上。而且呢，就是女性的那种，那种生理上的特点，比如说包括她这时候该怀孕了，这方面是不是有它一些特殊的保护，其实往往也是容易被忽略掉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强调性别，而且是去性别化的那种特征比较明显的那样的一个年代。所以在那个年代，就生长起来的，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人啊，有一种，就是说从来不会想到，就是说，噢，做一个女人，要怎么样有女人味，她一定要怎么样去小鸟依人，就像现在好多女孩那样，绝对不会那样去想。

所以那时候我是那种感觉，那时候年代里面是女的也不要穿裙子，女的穿裙子认为有“小资”情调，所以呢，不管大小天，要穿着

那种长裤子，长衣服，所以呢，不要显得自己像一个女孩子。一定要显得自己没有胸，不像现在一定要突出这个。（笑）还没有感觉，而且就觉得，唉哟，这有胸的话，就看着是一种，不是一种光彩的事情，是一种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包括在服饰上，包括那个心态上，就是一定要想着自己呀，要跟男人都一样。不应显出自己的那种性别，甚至这种性别应有一些情况呢，它也常常是要被忽视，要被忽视。包括那个，那时候我们常常上学的时候有学军劳动，还有学农劳动，干活的时候。

张：您是说上小学还是中学？

李：呃，我是65年的时候，上小学，到72年上中学，所以呢，77年毕业。65年就是文化大革命，一直到那个，到76年，呃，66年文化大革命到76年，十年时间。其实我就觉得把我那个小学、初中、高中基本上就给囊括了，所以，整个的成长背景应该说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成长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总体上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就在，包括心理上，也绝对不会想，一个女孩子要跟男孩子有什么样的不同。就这种想法就完全没有。因为那时候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你就觉得，你是有一种革命的激情在里边。包括，我觉得那时候我上完中学之后，我就特别想到那个内蒙的青年农场，我就想去插队。

张：那您老家在什么地方上的学？

李：我在天津。

张：噢，天津。

李：对，我在天津上的学，天津上小学，上中学。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说文革期间，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觉得就那样的一种，革命的那种豪情，啊，那种影响啊。所以上完中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下乡。但那一年呢，就要求你统统都要上高中。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就会一无反顾的就到那个内蒙青年农场就插队去了。

张：那个时代是谁的...还是毛泽东时代吗？

李：应该是，是。毛泽东时代一直到76年吧。

张：76年，嗯？

李：，对。但是整个那个，你成长的背景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以，那时候的那种很多的想法啊，我觉得特别受到这种大的那种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时有时候我就反省...当然，并不是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是会对这一种感兴趣，甚至有很多人可能不愿意下乡。我觉得我就没有，我就觉得好像在我的内心当中，我有一种就是那个...那个...崇尚那个年代，我觉得那一种教育的结果啊...比如说我特别崇尚那种英雄，崇尚那种献身精神，崇尚那种很高尚的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一种，那种，那种，那种热情在里边。包括那时候看的书呢，像那个《红岩》，啊，那些革命烈士为了革命，奉献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哎，就那种东西特别能打动自己，还有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像《欧阳海之歌》呀，哎。就是说就这些人就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那种，呃，就是那种为人处事。我觉得就其实会有一种认同，有一种共鸣，而且在内心里边呢，我就觉得总有一种，就是理想主义的东西，就是追求这种东西。而对于那些一天到晚的想的是怎么样活得好一点，物质好一

点，觉得非常的世俗。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在小学，我看那书...我说如果一个人在这种房间里边，他不能够，就觉得生活得很有意义，甚至说他不能在感情上有一种情感的一种归宿，啊，我觉得这种房子再大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反正我就觉得就轻物质重精神，就轻现实，重理想。实际上我就有那么样的一种，就是精神上的一种倾向。所以，这，在，我觉得文革期间呢，就是那种上小学，上中学的那段经历，主要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的。

那么到了后来，就是说为什么会对这个女性主义发生兴趣？我觉得还是和...到了二十岁左右，那时候该上大学了，而且我在家里边呢，很小。我家里5个孩子，那么上了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那时候我母亲老爱说，啊，我们家的男孩、女孩都一样。就是说都是同等对...都是同等对待，绝对不会说重男轻女。哎，那这一点我当时我也深信不疑，哎，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在家很小嘛，上面的哥哥姐姐都该结婚了啊。啊，其中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结婚，他们都是到外边去了。那么，最小的这个哥哥结婚的时候呢，他呢，就是，就把家里的两间房子，有一间就腾出来给他，那么，另外一间呢，当时我那时候已经是二十一、二了。当时我父母就说，干脆咱们都住到那小房间去，也就是8平米的小房间（笑）。噢，这时候我就感觉到那种，哎哟，生存状态一下子发生一种变化了。那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三个人挤到那个房间里边，你想看书，你想干什么，你发现那空间非常有限，而且这时候，上面的哥哥姐姐的孩子，

他们已有孩子了，那些孩子呢，我妈妈又看着他（她）。啊，整天那家庭环境，你发现就是热闹的不得了。

这时候呢，就是说，我母亲在考虑给我哥哥姐姐房子的时候啊，她绝对不会想到，噢，就是说她的这个最小的女儿还需要有一点她的空间，她不需要那么大，但需要有一点她的空间，这个空间已经被挤压没了。那么，就是这个...那么，我哥哥呢，他也会认为理所当然的。儿子嘛，好像应该，房子也应该是给他。那么，这样的话，我才感到，哎呀，我就觉得，好像一个人如果到一定年龄你要不结婚，你就发现，你已经变得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因为那时候那个房子很小（笑），家里的那个东西啊，就是那种...是...（我）躺在那个地方，上面放一个柜子，天天我想，这柜子会不会掉下来呀（笑）。它是揽在了那个，那个，等于就在，为了利用空间，那么他就把上面这个，那段空间空着的就放上柜子了，所以说下面就是一个行军床。就是那个，你就马上会感觉到你的那个生存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就会感觉到，哎呀，就是人要想学习，想读书，有些最基本的条件恐怕都不具备。那么这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呢，单位里边呢，那个领导过年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说，你看李惠英她们家...我们连个插针之地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嫂子一生孩子，这一下子更紧张了。你想这个房间太小了，根本就进不去人，所以他们感到很紧张。

那时候，房子都是单位来分，所以当时呢，我就说，我说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我解决一个十平米的房子，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空

间...稍微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了嘛。他们就说，那你结婚，你就马上结婚，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房子。呃，我说，这个事，你看，它是跟结婚连在一起（笑）。你要作为单身，这个房子，作为一个单位里的职工就不会考虑你，而是要考虑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所以这一点的话，你看，又变成了一个，噢，为了哥哥，他结婚了之后，你发觉挤压到没有空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这个单位里边呢，他又得考虑，你是单身的还是已婚的。要求你是已婚的作为一个分房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就说，好，你是为了房子马上找一个人结婚，因为你...在我看来的话，首先得有感情。那么，如果没有感情的话，你不能因为这个房子而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时候，你马上感觉到另外一种压力，就是说，噢，作为一个单身的，你想有一个独立的空間，你发现是有难度的，人们是用婚姻去衡量你的。所以，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的那样一种很艰难的地方。它不是作为一种你个人的权利，你可以去得到的。哎，他这样去看你，那么，这时候，好，那你涉及到一个，噢，你到了一个谈婚论嫁的年龄，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去选择和别人怎么去选择你。那么在这个，这一段的经历当中啊...就是，到了83年了，我觉得这个中国整个情况都在发生变化了啊，就是改革开放之后，那时候呢，上完大学之后，又要上研究生。那么，到了南开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的一种感受是，哎哟，我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床位了（笑）。自己的，那么，你这个空间应该是属于你自己的。

张：您是本科在南开？

李：本科在天津师大。

张：师大？

李：哎，对。

张：是哪一年上的？

李：我是 77 年，就是等于，对，对。就是那个高考第一次，那种招生，呃，就是通过考试招生。

张：那您是先工作了又上大学，还是先上大学了再工作？

李：啊，先，先下乡。

张：先下乡，还下了乡。

李：对，我是 77 年呢...先下乡...下乡回来然后上学。那么，那么上完学之后呢，又工作，就是到了那个...上四年在那个天津师大中文系，读了四年，等于是中文系。然后呢，就是分到天津财贸干部管理学校。

张：就您刚才说的单位就是这个单位。

李：对，刚才我说的单位就指的这个。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到了二十四、五岁了。那么，单位觉得呢，就是说，那你应该先，先，先有一个，先有一个家，然后我们这边就给你解决房子。好，这不是到了谈婚论嫁了吗，啊，那么，这时候呢，我觉得...正好就是我又考到了南开大学。那么，这时候就变得一边上学...还有一个就是谈婚论嫁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这个同学之间在南开的研究生当中，就是普遍有一种感觉，当时的，上研究生的女生还是比较少的。当时我们这个班里边，我就觉得上大学的时候，按说中文系，

现在的女孩子会非常多的，啊，可那时候呢，也就三分之一。呃，就是少，而且呢，那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是，在，我当时在 77 级当中我是属于...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二十岁。

张：小的。

李：唉，对，属于年龄小的。所以，年龄大的呢，比我能大出来十来岁。所以，有的呢，就是他自己在上大学，他的孩子呢，在上小学，就是形成那样一种局面。所以，那时候，就是，呃，上学期间，上大学期间，我觉得那样的一种风气，实际上在，已经有所变化。那么，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种感觉呢，就是说，我就，我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我应该拼命的学习。因为好像过去的这个十年呀，更多的时间实际上是被荒废掉了。所以那种学习的愿望特别强烈。那么，在上学，上大学当中呢，这时候，实际上整个的社会观念已经，我觉得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他们这时候对女孩子的要求，对男孩子的要求，这种差别出来了。不像在文革期间，无性化的。那时候，就是，好像更讲究是，都是革命同志。那么，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觉得，哟，女孩子，女同学，她应该更多有一种女，女学生的那样一种味道。就是她那个的心思在情感上这方面可能会用心更多一些，那么，至于更多的去学习，总觉得那应该是男孩子做的更多的。呃，就是，我觉得在背景上应该说有了这样一种变化。

那么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呢，就是说整个的风气更加的去注意到了男女之间的那种社会性别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呢，就是在男生和女生当中，就是他们认为什么样的女生属于比较理想的配偶。那么，

这时候他就觉得更应该是那种温情的，更应该是那种小鸟依人的，呃，不要事业上太强亮的。那么，就是说这一些要求实际上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那么，我们在一个宿舍里的我们这些女同学之间一聊起来，那么，还有很多的女同学都是愿意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去发展。啊，哪怕不是上博士，也是将来有一份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一种工作，而且有一个独立的自己的事业。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她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你发现就有很多的那种冲撞。就是说男孩子要求女孩子那种要求，实际上呢和你自己本身所追求的目标之间出现了一种距离。

当时我们那个宿舍里有一个比较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啊，她姓李，那么，跟我一个姓。我们俩在一块儿呢，她是历史系的，她那时候呢，比我大两个年级，是属于，我是83级上的硕士生，她是81级，大两年级。就是我到那个宿舍的时候呢，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这时候她就面临着她要不要考博士。当时呢，她就说，如果我要是考博士的话呢，我可能是谈恋爱，找朋友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艰难了。因为女孩子不希望...男孩子不希望女孩子学历太高。她说，我要不考的话呢，我有那么一种愿望，我特别愿意去上学。所以呢，她就斗争了足足有两个月，到底是考还是不考。最后她就说，啊，管将来怎么样呢(笑)，那意思是我还是先上学。

所以，你看那时候已经经历过一场斗争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呢，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呢，也是，都有这样的一种，啊，会有这样一种压力，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社会已经开始逐渐的把你们按

女性的一种要求去要求自己，可是你内心里，包括你从小受到的教育，包括你的那个整个成长那种背景，你都有一份那样的一种理想、热情；但你已经感到了，噢，性别，所给你带来的一些，一些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可能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哎，使得我就对于很多跟女性相关的话题发生兴趣。

所以，那时候呢，当时我还印象当中，无论是研究生之后...按说我的年龄已经是到了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之前呢，就是上了那个，就是在单位是在二十五岁左右，所以那时候，单位同事也都特别的热情，说，哎呀，你有些什么标准，那个，就是看你那么热情开朗的，就到这个年龄好像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啊。然后，我说，我说我这，我没有什么标准，我说我只有一条，我说我就希望能说得来。她说你这条标准叫我们无从把握（笑），你要求多高，有什么样的学历，这事都好办，就唯独你这条，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给你能说得来。那么，就这一点啊，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内心里就是特别注重就是一种精神交流，我把这一点看得很重。所以，我外在的东西，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至于他的学历，他的什么身高，至于什么长相、家庭。那些东西的话，我姐姐跟我一说，呀，你千万别找一个农村家庭的，他将来搞不好，他们家成群结队的，把你们家作为一个旅馆。我想，她考虑问题好俗气啊。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的那个充满了理想色彩的人。但是我到现在，反过头来我再去想，我觉得我坚持这一点啊，真是应该使我感觉到是对的。就是说当时我的感觉就说，我哪怕独身，如果

我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够，就是找到我所喜欢的人，同时他又喜欢我的人，我们俩赶到一块了说不完的话，我说我就不结婚。就是，我就觉得我那个个性当中好像有一种东西，好像我很难去，就是随波逐流，就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那时候我大姨就说，说，噢，惠英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笑）就那么一个感觉，啊。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我自己这样的一种个性和我自己这样的追求，所以使我呢，就是说，我觉得跟现实当中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有一种冲撞在里边的。那么，可能是我去关心它，而且特别是这种，它就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也使你接触到了一些人。

那么，最后我就觉得，啊，我觉得我最后的这个结果上，应该说是我很满意的一个结果。因为我就抱这个想法，不合适的话，我就跟本不去结婚。所以呢，我只有感到，哦，我们俩在一块...后来跟我，因为我爱人是个外地人，他那个，在别人看来的话呢，你现实一点，你已经来到了中央党校，找一个北京的，这样的话呢，对你以后都带来很多...减少麻烦。可是我这个人就因为太看重这点了，我特别的执着，这一点。所以，当我们两个人，就是遇到的时候，在一块聊的时候，哎哟，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谈不完的感觉。真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太重要了。就是，就是这个...所以我结婚的那个时间啊，我是，啊，等于三十一岁，应该说晚。就是，以至于晚到了，那时候，那时，有一些女孩子，在天津，她们一说，唉呀，说那个，你看那个李惠英还没有结婚，她们说那么大没结婚的人那是什么样子？还专门跑到北京来，来看一看你。也就说到那时候，你就发现，噢，人到一

定年龄没有结婚你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的。那么，那么就是说你就感觉到了，噢，那种单身，单身到一定的年龄也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单身的空间，单身的住房，和你这个，这个单身所要付出的那样的一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周围的人怎么去看你。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个人比较执着，这一点。所以呢，从这一点就反观我，我觉得，呃，好像我就是一个人，就是比较充满了一个理想色彩的那么一个人，而且会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来去坚持自己这一点。可能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就是后来的就是妇女研究，使我在这里，我觉得我有一种认同。那么，呃，来到，就是，这个...等于婚恋问题是到中央党校之后。

张：嗯，您什么时候来中央党校的？

李：我是86年。是研究生毕业之后。

张：研究生毕业。

李：哎，那时候在研究生毕业分配的时候，那时候还特别好找工作，当时我们那些同学在一块一商量，说，哎，咱们干脆都到北京去吧。啊，然后呢，那我们就要到北京去看一看。这样的话呢，就到北京，就北京这些地方，啊，我们就跑了一趟。那时候很需要人哪。所以他们就是，那就马上统一，然后就开始呢，就到南开大学，他们就去做工作去了。呃，那时候，包括我还找了一个语言学校，本来我说想看一看，因为我说这个学校呢，对我来讲的话呢，一定要有图书馆，一定要有饭堂，要有吃饭的地方。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愿意做饭，(笑)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女权主义有很多的东西对我来讲的话呢，哎，跟

我有一些东西是合拍的。我不愿意做饭，这样的话，有一个食堂解决我吃饭的问题。那么，有书呢，哎，这个，这个看书就比较方便，啊，所以这两条。再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宿舍。因为我觉得我太需要有点独立的空间了。那么，这个，哎，这几个条件呢，我就觉得中央党校的情况要比那个语言学院的情况要好一点，语言学院它有一些书，但是它语言的书多，但是我呢，就是说像人文的，社科的，我觉得这个领域我需要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样就来到了这个中央党校。

我主要抱着一种想法是要具备这样的几个条件。那么，来了之后，等于说在这个地方，就是，那时候是二十九岁吧，三十岁去跟我的先生交往。那时候，他是，我们在一次会议上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后来交往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哟，这个，这个共同语言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就是那种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还不是说看他长的样子。就在一块聊天，聊天就觉得，哦，好多东西会有一种共鸣。所以呢，我就觉得可能我，我，如果跟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的同学也没有结婚，可能她们也坚持，哎，可能想法还不太一样。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说，噢，你找到了一个是你希望找到的人。当然，也为此，我觉得也会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笑）有时候你要为你这种理想，啊，包括，噢，往北京调动的问题，咱们的户口问题，工作单位问题，而且由于你那时候你不想要孩子。他分房子的时候还有条件呢，你有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不分房子。我觉得这都特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你是不是结婚，你是

不是有孩子。那么，当你都没有按着这一切的常规去走的时候，你发现你老不断的会在政策当中被排斥出来。所以这可能给我的那种感受挺深的，我觉得就从一个无性化的，那时候充满理想的，到了后来就是有那么多的...你感到了，唉哟，做为性别或者婚姻，它给人带来的这些东西，包括给你的生存空间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可能这些都，我觉得都是使我对于妇女研究会有一种认同。来到中央党校之后呢，到了 90 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 95 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世妇会。

张：86 年您到中央党校是做什么工作呢？

李：我是一开始的，我就是，当时就是在，要去语文教研室，当教员。到中央党校之后就告诉我说凡是新来的都要有一年的锻炼，那么这个锻炼呢，就在中央党校的另外一个叫《中央党校通讯》当一年的记者。哎，这一年的记者呀，挺有意思。然后你再去教研室。这就是锻炼。

95 世妇会，我们打算，中央党校打算，就是说，呃，有个男同志，男老师，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做一些事情，为 95 世妇会。当时就在学校里申报一个课题，这个老师叫，姓陈，叫陈瑞生。我觉得他是属于，这个老师呢，男老师，当时的年龄已经是五十出头了。我觉得属于呢，对于新的东西比较敏感的，而且充满了热情的一个老师，还是个男老师。所以那时候，他就想呢，就申请了一个课题，就是关于女性的领导的成长规律，要采访，访谈一百来位女领导，特别是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所以呢，这个课题呢，当时因为我也就是，

稍微写了一点这种文章。所以他也就是把我找到了，他说你喜欢不喜欢参加这个课题。唉，我觉得也挺好。就这样的话，你等于这个，我觉得这个课题的出现呢，又跟 95 世妇会发生着一些关系。

所以，我想，就影响就自己那个生活道路当中，实际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契机，象 95 世妇会。因为它在中国开，所以当时就有大量的人开始去关注到这方面问题；而且特别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和 95 世妇会发生一些联系。那么等于说我觉得这个课题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课题呢，出现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访谈。那么这个访谈呢，我觉得到了中央党校之后...那过去我们搞东西呢，是查报刊杂志，然后从那面去搜寻一些东西，然后再去看我们怎么把这些资料给它整理出来。这是一种搞法，我觉得是文献性质的，啊。那么在这个课题当中呢，那么就要深入到很多的女领导干部中，就像这样子，搞访谈了。哎，那么这个访谈当中呢，就是接触到了一些领导干部，她们有时候聊起来的话，我觉得有时候聊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包括她们自己很多的酸甜苦辣。当时我忽然间有一种感觉，我觉得真是你好象进入了一个社会生活的领域和女性领导的那种心灵世界这种领域。而这个领域打开之后，你发现和你过去所感受到的东西有着非常大的距离。过去你看到的那些领导都是她们特风光的那一面，是这种感觉。哎呀，那么多人，她做讲话，做报告，那么多人去围绕着她。但是你对于她的那个不被人知道的另外一面，内心里的酸甜苦辣，实际上往往是一无所知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啊，跟她们接触，我就感到，哦，你认识了一个你过去所没有接触过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很多

很多...她们不仅有那个跟男性同样的一些经历和遭遇,甚至还有很多是她们独到的女性所特有的。

那么,我记得我那时候采访了一个是南通市,中级法院的院长,她就在中央党校的副厅级班学习。中央党校的班次有很多,那么,它有省部班,有厅级班。她就在厅级班学习。当时我跟她谈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她跟一般的领导不一样。因为很多的领导啊,她会讲起话来比较注重分寸,比较知道说什么,不说什么。她不是,她是那种非常的敞开的谈自己。那么,包括谈到,就说她在,她在这身兼几职呀,她是南通市中级法院的院长,而且是党组书记。那么,就是她有这两项非常重要的职务。那么,她的这个,到这个职务上来了之后,这个时候她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可是家里头有三个孩子,她也是下乡知青,到内蒙生了三个孩子。那么,然后呢,又来到了南通,到了南通之后呢,又迅速的随着这个“四化”,(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干部队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过去呢,它是不要学历,要那个劳模,而现在变成要学历。那么这些老大学生就开始,哎,就是被重新启用了。那么,她呢,在这个岗位上,还有三个孩子。而且她的父母...父母只有两个女儿,她为什么要调到南通,就是为了要照顾父母,她父母都属于老革命。这样的话,她家庭负担就非常的重,而她的丈夫在公安局工作,丈夫是一个觉得做家务是女人的事儿,他不管。所以呢,她有那么繁重的工作又那么繁重的家务,她的内心里一直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给我讲这种感觉的时候,她就说,哎呀,她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她平时

呢，那个工作压力就很大，到了双休，一到了礼拜天，这个时候她有三个孩子需要她管，还有老人需要她管，紧张疲惫的要命，她有的时候工作和那个家庭冲突太厉害了。有一次她就是，有一次，她就那个，到下边的县级法院啊，到那儿就是去考察工作，结果这时候呢，她的老父亲就病危，她呢，就来不及，就当她的返回的时候，她父亲已经去世了，她一直对她的父亲有一种歉疚之情。她说我是一个好的法院院长，因为她每次的投票率呀特别高，就是人大要投票嘛，对她的工作，她的投票率遥遥领先的，高票当选，她说她是一个好的院长，是一个好的党组书记。但是，她说我不是一个好女儿，不是一个好母亲，因为她那几个孩子学习都不好，她根本就顾不得他们，她内心里那种痛苦那种冲突特别厉害。那么，这个，我就通过跟她的接触，不仅跟她，当时南通呢，南通这个城市是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城市。在我们其它的城市里边呢都是女领导干部非常非常少，但是在南通，正职的女市长是女的，法院的院长，交通局长，哎哟，十来个全是女性，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当时我就一个一个地方去跑，包括工会主席完全不是花瓶似的。干得很出色，而且非常有思路，她很知道我在这个岗位上我怎么样跟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要相一致，我怎么样要推进它的改革，推进它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改革当中的那种一个单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完全和我们说的下岗女工那种境况的那种女性，反差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通过就采访这些人啊，使我对于女性当中很多特殊的问题，特别是参政女性特殊的问题有很多的了解。我觉得应该说这是我，就是进入到妇女研究当中的的一个起点。但是那个时候呢，但是那

那个时候呢，我的那种感觉呢，呃，我觉得还很难说跟女性主义发生一种密切的联系，我觉得还很难这样讲。就是，实际上你没有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理论背景，完全是跟你的生活经历，或者说跟你以后的课题发生联系，你去接触它们。所以我当时对西方的东西我是完全不了解...

张：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您的这个生活、成长和工作的这种经历，也采访了那么多的女性的优秀人才，女干部，那么从中呢您有很多感受，那这个跟您女性主义思想有什么联系呢？

李：应该这样说吧，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在...可以说这些都是，正因为你接触这些东西，然后你再接触女性主义理论和思想的时候呢，你才会有一种认同，你才会认为它这里讲的有道理。就是说对它的很多的想法在这个基础上你才会进一步去理解它，它不是在这个空白的基础上。

那么，到了那个 95 年的世妇会，我觉得这应该说是，呃，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开始接触到了国外的一些女性主义，包括社会性别的一些观念和意识，我觉得应该是在 95 世妇会之后。那么 95 世妇会之后，当时呢，就是像那个北京的行动纲领那里面就出现了社会性别的说法，包括呢，将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哎，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引发了一个想法，就是什么来着，就是过去我们过去注重的是采访妇女自身，那么来看她们自己的一些角色当中一种冲突和她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就女性来看女性。那么这个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

流呢，哎，它把这样的一些问题和国家的责任，和国家出台的政策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把你的思路啊...我觉得我会找到，就找到一个结合点。因为我们在中央党校工作，中央党校那么多领导干部，那么，他们在怎么制定政策，就会对妇女发生影响，那么怎么样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能够有一种性别敏感。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95 世妇会之后给我这样一个，包括行动纲领的，这样的启发。那么，这时候呢，社会性别的这样一个观念也就开始接触到了。

那时候呢，就是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葛友丽当时还在那儿工作，啊，那么，那个，她就想搞一个培训手册，“社会性别与发展”，连社会性别的说法，当时的意见是特别的新鲜。那么，呃，就想搞这样一个培训手册。因为过去呢，都是，觉得都是，把国外的东西拿来在中国搞，那么现在呢，就想是中国搞了一本，就是既有国外这样的一种思想背景，它的价值观念，甚至它的一些主要的方法，同时呢，又有中国的一些案例，想做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找到了一个，一个结合点，而且大量的开始接受，接触就是这种西方的，特别是社会性别的这种内容。那么，接触到这些内容...社会性别这里面的...我觉得社会性别实际上给我的这个感受当中很深刻的地方，我觉得它的基础是权利，呃，就那个 right，啊，是这样的一种权利。还有赋权的那种含义，就是那个 empowerment，对，还有一种赋权的那种含义在里边。有一种权利，而且呢，它这里边的这个权利，按中国的话讲呢，它应该是两种意思，一个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

人的那种自主性，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内容、概念啊，我就感到里边特别的，就是含义非常的丰富，而且真是我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社会性别是一种非常富有魅力的概念。实际上魅力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就是它的那样一种，就是教你权利的观念。你一定要把那个“利益”的“利”，这个打出来，这个英文当中是 right，就是那个...

我觉得是利益的“利”，就这个权利的就这个含义。因为，这个在，我觉得这个，对于权利的那样一种认识啊，我觉得跟我们以前比起来的话，我们这个计划时期，实际上我们常常也提男女平等，妇女与男子有同等权利。但那时候我们对权利的内含并不认识，而且我们常常在工具的这个角度上去认识它的价值的，实际上党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解放以来那个，应该说是妇女在争取权利当中有非常大的悲哀，因为它已经变成工具了。但是这时候，社会性别当中呢，它突出了这个权利，就是人的自主性，人的主体性，人要，你要知道你的权利在哪，而且你要自己去争取这个权利。我觉得这时候呢，就是对人的认识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对女性的认识。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如果在西方它可以分两步走，那么在中国的启蒙文化当中，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它常常是先接触到了社会性别的东西，从这里面再挖掘权利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经历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接触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两个，蕴含两个东西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女权主义思想的萌发，我觉得是可以跟这一段结合起来。我觉得已经不是在过去那一种很朴素的来看这种角色的一种冲

突，来看男女间的差异。而是这里面呢，就是从人的自主性，还有一个就是另外的权力，就是那个力量的“力”。力量的“力”在这里呢，我觉得为什么很多妇女的权力没有，当然包括中国的很多男人也没有。中国在看社会性别的时候，跟别的国家，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种不同。别的国家呢，是男人有了权力，女人没有。在中国呢，有的很多地方是同时没有。当然，女人有的地方会更加没有。

所以在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会，其实对我们过去的很多文化都会有一种反思在里边。我觉得这应该说是这样的一种思想给我的一种启发，所以呢，这时候你再看问题的时候不再像过去那样子，就是说你会反省很多东西，包括生活当中很多的现象。你看这里边，就是人的这个权力是怎么样失去的，而且呢，人在失去的时候是，他的心里是怎么样去，是看待这个问题的。其实在中国的不管是男人女人，特别是女人当中，有很多是作为...把失去权力是作为一种美德来看待的。它作为一种美德，作为一种美好的东西。因为“无我”嘛，中国文化当中讲究“无我”，实际上是忽略人的权利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呃，这样的话呢，有好多文化呢，实际上把那种好多，母亲...那种贤妻良母是大量的来歌颂的。可是在那些女性形象当中，实际上人的基本权利的东西是被无视，或者是被抹杀掉了的。

我觉得，我觉得这方面，当时我们那个，呃，就参加了那个全国妇联的课题，就是“大众传媒与女性。”当时有一部分呢，就是关于电视剧当中的女性形象。就是让我来做。我觉得这时候，我在看这些人物的时候，我背后已经有了一个东西，就是，就是权利的这样一种

权力的东西在里边。那么在看的的时候，就是说我不会再去认同那种贤妻良母的形象。可能我在骨子里面一直就对那个做饭这些不感兴趣，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我会觉得献身是一种好事。献身，革命者的献身精神，是工具的东西我会认同。那么，现在我就觉得我不认同它了。我觉得在这里边呢，很多的传统的母亲形象值得反思，包括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女强人”的形象也值得反思。女强人形象在这里边实际上它的独立性要更强，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女性，实际上是在传媒当中弘扬的是贤妻良母，贬低的是女强人。那么，在这个里边，从权利的角度来去看的话，那问题在哪里？那么，还可以从大众传媒当中还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大众传媒啊，它是真是跟就是那种前30年，也就说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这30年有着非常大的变化；那时候是无性化。而现在呢，是强调“回归传统”。那么，这种“回归传统”当中，有很多的女性形象当中，在媒体当中，你看包括那个刘惠芳，啊，那是多受到欢迎啊。那到底怎么去看待她，认识她？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要反思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些现象也很有意思，你看那个同样男的和女的，都是老板，当他们一恋爱结婚的时候，找到异性的时候，男的一般的是出让的是财富。哎，我有钱，我给你买房子，我给你大把大把的钱花，给女方是财富。可是女的是个老板，她跟他一结婚一恋爱，你看我们媒体当中啊，倒不见得是生活当中的，它这时候出现的女性，往往是，哎呀，我把位置让给她的那个男友，以显示我们俩的感情，出让的是权力。这个力量的“力”，权力。就是我是个老板，我把这个位置出让给你，哎，我去当你的配

角去了。所以，那个《北京人在纽约》里边的那个阿春，她不是吗，也是给那个，那个王启明，啊，就是让他，他就...好，呃，这个你干吧，我就当你的配角。所以呢，一个是出让的是财富...男的出让财富，女的出让权力。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当然实际生活当中，我看了看那个阿春的那个...曹桂林写的那个《北京人在纽约》，实际上他的原型当中并不是这样做的。但这里边呢，在电视剧上被改编了，那么是，这里是男导演的一种理想在里边，这是他所期盼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男人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有这种差别？那么他出让财富呢，实际上你...我给你的财富越多，你接受越多，你对我的依赖性越大；那么，出让了权力呢，那么实际上呢，你是把一个管理的，一种主动的位置让给了男性，而你做他的，要做他的一种，就是说，怎么说，配角，还是“男主女从”的一种观念在里边起作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边呢，就是如果你要从权力的角度来去看，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现象都是非常值得反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期，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女性主义对我的那种影响，我觉得使我，应该说抓住了这样一个观念的概念。所以那时候，当时95年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就是，就想，呃，当时在搞了个妇女研究中心，也是，在这之前还是那样一个阶段，就是很多很多很朴素的一种想法，就希望在那方面多做一些事情。所以呢，95年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们几个女老师一块跟学校要求，哎，经过学校批准，就搞了一个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

张：是哪一年？

李：95年。

张：95年。

李：唉，95年。

张：中央党校，现在还在？

李：对，现在还在。对。

张：您是在这个中心里做？

李：哎，对。在这个中心里呢，我呢，就是做一个副主任，就是分管这种科研工作的。当然这些呢，就是，我觉得应该说是中央党校内部的那个 NGO，也是属于就是像这种...经费其实我们都没有，只是有兴趣，然后我们一块做些事情，啊，是这样的一个。那么，当时，我呢，就从中央党校的文史部就调到科社部，因为科社部里面有个社会学教研室。这个教研室呢，它可以呢，一个是我们对妇女研究中心挂在，就挂在科社部，而且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教研室，社会教研室里边专门可以研究妇女问题。当时我就觉得我在文史部里边呢，我讲的课程的很多内容和我的那个关注点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去这样一个专门去搞妇女研究。所以，就这样一种想法，就跳过来了。这样的话，一个是呢，我们妇女研究中心；一个是呢，我就是来到这儿，专门要搞这样的内容。那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是95世妇会，人家就觉得，噢，你这样去，人家都还可以理解，95世妇会嘛，好像我们再有一个追潮流的就容易追。那么，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们就会说，唉，你现在还搞妇女研究啊，她就觉得你应该是差不多了，就是说已经潮流都已经过去了，

95 世妇会也开完了。而且那时候呢，我就印象很深的是学员讨论的时候，我们常常下班了。那个，学员，就是，就是我们一块去的同事就会介绍，说那个...这是我们单位的老师，副教授——李慧英，她所搞的研究呢是妇女研究。这一介绍呢，学生“哈”就都笑了。唉，这种笑是什么呢，就你感到它里边，妇女还用研究？就是，就是社会上当中，实际上对这些内容的话呢，实际还相当不理解的，我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自己呢，那时候就是说经过了从 95 世妇会一直到后来，就是这个几年的那种研究，包括重新去反思好多的问题。

后来我就在 98 年左右，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在我们党校《学习时报》上发的。名字就叫《我是搞妇女研究的》。我就说...我就谈了我自己那样的一种感受。我就感受说，我说这几年来我搞妇女研究啊，尽管外表上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是我觉得我内心已经极大的改变了。那么，我说，这里让我重新认识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那么，这个，因为我觉得那个女性主义的这个，这个东西，实际上真是一种，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它还是一种，人文精神，而且呢，是一种人可以重新去塑造自己的，带有行动性的那么一种。呃，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一种东西。所以它对于人们的人格它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接触这个女性主义的这种思想的时候呢，也同时接触了这个圈子当中的很多的妇女研究的学者，或者说女性主义者。

当时呢，就是我在，记得 96 年的时候，就到那个河南，李小江搞一个，就是高校的就是妇女研究的一个，比如说怎么促进在高校当中发展的一个会议。当时这个会议上呢，就是李小江呢，她就是把她这

几年研究的很多的方法、内容都，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讲，在谈。但是我觉得里边有很多讨论，而且也有很多的启发。当然，李小江她在妇女研究这方面接触的更早，而且有很多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那么，这样的会议，还有后来呢，我觉得，就是像，到香港，当时韩国...中国到香港去访问，还有香港的学者在一起，我们呆了六，七天。当时我觉得，有几次活动给我的印象更深，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就是说，你不仅仅接触到的是一些观点，一些想法，而且包括他们怎么行动，他们怎么去处事，包括他们怎么样交流，它都给你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那种参与式，人和人的平等相处，还有包括呢，自我那种反思。就是我在参加过那个河南的会议之后，当时我，当时我是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就是我会听那些东西感到非常兴奋，会引起我很多的联想和思考。夜不能寐，因为上研究生是中文系的，那么也常常参加一些就是文艺理论的那种会...美学的会议，但是我觉得那些会议都不足以给我这样的一种震动，那么，这个给我一种很强烈的震动。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会有这么一种，就是那么一种，你感觉到你有一种震撼，你有一种激动，为什么？里边是有什么东西在里边起作用。我就觉得实际上这里边哪，是这些中国的很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她们实际上就把自己的那个学术研究和她们的人生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了。她不仅把作为学问，是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我觉得在这当中的话呢，她们那样的一种追求，你可以看到，她的那种，我觉得人格上的那种追求。我觉得这，就是一旦转化成一种人的内在的那种东西，一种追求，一种发自，来自生命本身的追求，我觉得这样的话，真有一种特

别大的力量。它是跟...我们通常呢...就是，所以，你就看到它跟很多世俗的东西有一种不同。我是感觉到，就是说有一种特别可贵的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上，它就是说使你由过去的一种，就是由一种工具性的人，变成，要变成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自我赋权的人。因为在过去的很多事情，噢，我们习惯于教给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好好做什么。从总的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在一个大的，那个，就是这个，这个，组织的那种环境当中，去遵循它的一种想法做事。而现在呢，就会觉得，我要怎么样主动的去争取。特别是我觉得妇女研究，那时候在中央党校里面，学生觉得很可笑嘛。就是你周围的很多人不理解你的，那么，这时候你要争取很多的活动，你发现，你要不去争取，这个事就可以不做。那么，你要争取的话呢，你要费很多很多的力气。但是，你会觉得，噢，你改变了一个方式，你不在是人家要你做什么你才做什么，而是你在主动的，你追求到一种你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你要把它去做。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 98 年，这个妇女中心，我们想在那个，党校中青班的搞社会性别的培训。那么，那么，这个内容呢...当我们提出想法的时候，人家说什么是社会性别呀，搞这种培训有什么意义呀？太困难了，就没有人去理睬你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找到了全国妇联，那时候，李秋芳还在那个办公厅。后来我说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说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了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当然这一点，我觉得这中国的话语和西方的话语可能要找到一个结合点。

(笑)那么后来我也就开始思考男女平等这个国策和这种社会性别到

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可能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当你要想推动一个事情的发展，其实你单凭个人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有限。比如说你借助一些我们这个国家...

张：主流的...

李：主流的话语，但是你要把你的社会性别的那种精神应该给放进去。我在这上点，我倒觉得，可能中国的妇女发展的策略可能跟国外有一种非常大的不同。国外，你就直接说出来嘛，新的东西怎么不可以，是不是？它有它的一个空间，可是在我们这里边的话，你要不把它用一定的主流的话语，这个东西就很难。但是实际上我们后来用的是社会性别，那么后来呢，就是她们妇联呢，她们出了一封信，就是我们愿意跟中央党校妇女中心一起来搞这样一个培训。那么，到，到中央党校的那个，就是那个科研部，他们看了之后...科教部...它就觉得，噢，这个事还可以，因为妇联有一种信任感，这是作为官方的主流，可以信任的一种...一个机构。所以这样，因为你一个 NGO，他会觉得，你搞的是到底什么名堂，你看，他会这样去看你。所以在这种推动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还会借助很多的，被官方所认可的一个机构，合作起来，来去推动。

李：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搞的叫“社会性别”，实际上就是把一个就是这种女性主义的那样话语拿到了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当中搞参与式的培训。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弄成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也就是说，你就

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经过你的努力，你就可以去争取的。而不是在一种被迫的等待，实际上这对你的人生都有很多的新鲜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呃，把自己变成一个主动的，就是能动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呢，都应该说，我觉得这种女性主义呀，它真是那种行动性很强。它不仅仅是在说，而是在去做。包括呢...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到了那个 2000 年，因为这个社会性别的课程，包括妇女研究的课程，怎么样进入到我们中央党校的这个研究生的课程当中来。我们是 99 年，我们就争取到了社会学的一个硕士点，社会学的研究生的硕士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招研究生了。研究生当中呢，这时候呢，呃，怎么样把这个课程进去。当时，我就提出来一个方向，就是说，这个，设一个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的方向。这样的话呢，我们招研究生，我们专门有些人。当然，它的课特点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上课的时候，不是说你带着两名研究生学生学，而是上社会学的这个，这个 7、8 个人，它所有的课都你要学。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社会性别的很多的那种理念，你同时可以给学生，传给学生。我觉得应该说这也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搞女性主义研究实际上很大的一个任务是要在中国传播。

所以呢，就是，那么要想进入这个里边来，当时遇到的问题也是，就是什么是“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性别”，当时我们那个部里主任打电话说“社会性别”是哪...怎么回事呀？就是说法你就觉得很...太新鲜了，没听说过。那么，我就跟她讲，我说目前是国际上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而且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思潮。在很多

的国家都已经开设这门课了。所以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如果开的话，应该说是走在前面了。(笑)当时呢，还好，我觉得。因为都是新的课程，不是说课程里已经有了，而都是新的课程。那么，这时候呢，你要是，只要是坚持，而且你作为个人去坚持你这个方向上，而要把这个课给拿进去。就这样的话，就有几个回合。也是在那儿不断的就会发生的一种--有没有必要，要不要把它加进去--就是这样的一种争论。好在呢，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们这个，有个妇女研究中心，另外还有一些老师也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就好几个人形成努力呀，唉呀，有这种必要，应该把这些东西加进去。人多势重。(笑)那个和一般人说话感觉不一样，所以，就在这种努力下，就把这些作为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和方向就给确定下来了。我觉得这个也应该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争取和努力的结果。因为在传统的社会学学科当中呢，根本没有，根本就没有。但是呢，你要争取一下，它就可以争取进去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我们那个社会学我们有三个班次，就把这些课全都给开进去了。一个呢，就是社会学硕士研究生，是属于硕士生，拿硕士...

张：学位的？

李：呃，学位的。呃，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属于在职研究生，那么这个在职研究生呢，它是属于，呃，就是正在岗位工作的那些公务员，副处级以上。然后可以参加考试，获得社会学这样的一个学历，但是没有学位。那么，这些人呢，现在都在职，而且都是处级一些的领导干部。那么他们是两年制，变成双休日上课。那

么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个社会政策当中，就把这样的课的内容就给它加到里面去了。再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导师制，在职导师制研究生，是厅局级的干部。厅局级的干部呢，他们这种上法呢，就是半年上一次，半年上一次。那么，又把"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作为一个选修的课程，选修当中的必修，其实不能说你想选就选，那你必须要选的那种。这可有中国特色--本来按说你选修，你要让人必选--也就给它加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现在已经在好几个班次当中。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那种研究和教学把它给结合起来，这样来搞。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就是开始，就是大量的，我觉得就是处在哪一种状态当中呢，噢，一方面你要了解社会性别是什么？女性主义是什么？垮垮要翻大量国外地方的书。另外一个，你还要，同时要看，噢，我要给这些学生讲课怎么样他能够接受。那么，中国的状况是什么？这一理论一直是在中西文化的撞击当中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它的那种好处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女性主义还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它那里有很多的那种，呃，思维方式，有好多的观点，我觉得对于我们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特别是社会性别当中。实际上我就觉得它可以多分成几个层次。那么，常常会被提到，就是说，能不能把西方的东西拿到中国来。我觉得在中国的这种文化当中，这个，国际的女性主义的进入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这里边，特别是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基本理论的话呢，它不应该是仅仅看到西方的，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提这

种说法的时候，你就看到封闭的中国在看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女性主义在第三世界，在那种发展国家，它也是非常有市场的。应该说是国际化的一种女性主义的。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它本身有很多很多国家的那种经验性的东西给它概括出来的理论。我觉得在这点上呢，女性主义它是有开放的，而且也应该是发展变化的。

那么，在这时候呢，在接触到这些内容，然后在讲课的时候...讲课的东西不能仅仅是把它的东西拿来讲,好，你结合中国的东西怎么去看。我觉得在这里边的确有一个，嗯，就是怎么融合，而且怎么去筛选，而且目前呢，就是中国那个女性主义的发展，因为你的那里有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样再去看啊。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中国的女性主义从90年初期到，到现在，那么，大量的，现在，就是在翻译，呃，借鉴，而且把国外的东西拿过来，这个工作一直在做，非常必要，因为你不拿来，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唉，一定要拿来。那么，这个，拿来的同时，这个时候，你可能才会有比较。你要看哪些东西属于普遍性的，哪些东西属于你可能要跟中国的现实结合。我就觉得那个摩赛他那个讲的三重角色。你看他跟...就发现发展中国家跟那个发达国家就不一样。你作为发达国家的话，它那种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非常明显。但是到了发展中国家，那妇女本身都不是一种角色，都其实都不能仅仅在家里，那中国农村里更是如此。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说，他们本身这些学者，他也是一种到很多的国家去研究，然后这时候发现他们不同地区的不同现象。那么，在中国呢，一个农业大国，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

的话呢，真是更体现出来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异。特别，你看，他们会强调性别分工，为什么？因为性别分工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的多。但是他们会很少强调从夫居，婚姻制度。但是，在我们国家，（从夫居）婚姻制度这一块，其实在农村当中是特别普遍的一种情况。而且，它对于很多农民...农村妇女的影响太大了。包括土地问题，包括她的那个...包括她能不能受教育。因为你要嫁出去嘛，我何苦给你花那么多钱，都跟婚嫁制度发生联系了。那么，这一点呢，你再看西方当中就不太明显了，因为他(她)们俩人都独立出去过，不太明显。而且呢，它是城市化当中，农村人口已经非常少，而我们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我们这个问题是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借鉴的时候不是一个机械的照搬，而是它的很多的理念拿来去分析、认识中国的问题。可能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一步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把它东西拿来，而且呢，不断的来去反思、思考，甚至消化。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更多的学者也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当中的话，可能还考虑到中国的那种特点。绝对不能用中国的特点排斥国际上的女性主义思潮，但是国际女性主义思潮不等于把这个东西搬过来，而是把它用来分析和认识中国的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上呢，就是一个如果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用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来去分析认识中国的很多的现象。我觉得这一步做深入的话，可能会形成中国的很多特有的一些对问题的解释和分析，这一步是非常必要

的。但是这一步呢，应该说刚刚在起步，就是说还显得...我觉得显得还不够。

当然，这方面，杜芳琴老师她们那个，像把那个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引入妇女史的研究，来看中国社会性别制度怎么产生的，应该是在做这样的一种尝试。而且呢，现在呢，好多包括反家暴。你看，噢，国外的反家暴是那样一种形式，到中国来是什么样的特点，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样的变化。而且呢，这个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样...考虑什么样的对策更有针对性。恐怕这些我觉得都可能需要中国化。这个中国化和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化这个本身之间可能，应该永远是个互动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我倒觉得，就是中国女性主义呢，在这方面应该说前一段的工作做得很不错。当然，即便是以后，这种互相之间的借鉴、互动，而且现在，你看，非常注意这一点。那么，不仅仅是再看一些书，是遥远的西方的那种感觉，不是，而常常很多国际上的活动实际上都互相之间交流很多，包括我觉得这个访谈本身就是国际的这种合作的一个结果。是吧？就是中国实际上是越来越融入到了，这个...国际的女性主义发展运动当中来，我觉得这种感觉。而且呢，就是，包括国内的很多的华裔的学者，像王政她们啊，在国外，那么，这时候呢，也常常在这方面有很多...搞过很多很多的活动来促进这样一种交流。我觉得的确都是非常的有益。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下一步的话，那么，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很多有特点的东西深入的剖析，里面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的很多东西。包括这个从夫居里面，就是使女性的身份的不确定性。那

么，即便是在我们那时候“男女平等”的年代，共产党所倡导的那个推进妇女解放的年代，你仍然会感到那样的一种，那样有深层次的影响。因为，我觉得有些例子的话啊，在国外，他会举很多女工的例子，就是工业带来的对女性的影响。但是我们由于这个婚姻制度，人们对于女性的那样一种，从私的领域当中认识她的身份和价值，它是那样的不确定性。在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值得挖掘。就像那个红军奶奶是怎么消失的？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那种女红军。可是我觉得在文革期间，那时候我们常常会谈...就是说请老红军讲故事。在我的印象当中，全部都是红军爷爷，没有红军奶奶。那么，这样的一批人，为什么她就被消失掉了呢？那么，后来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好多妇女研究学者做的这些工作，我觉得很有价值的。又把这样的一些人找来，访谈。然后，她们就讲述她们自己的那种经历。本来她的身份是个女红军，后来有些女红军就在战争当中被俘了。而且呢，就被对方作为他们的老婆...强迫你作为他的老婆。那么，这时候你发现她的一种身份上的变化非常有意思，从女红军变成了反对女红军的...

张：红军奶奶最后给抢救出来了，再不去访谈，真的就没有了。

李：没错，没错。所以呢，你看，她本来是个红军，女红军，她们，她一旦被强迫跟那个白军结婚，变成了白军的家属。

张：嗯。

李：你说这个身份怎么去确定，如果按照她自己的个人经历来看的话，如果是个男性，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红军嘛，是吧？那顶

多是遭受了敌人的又一次折磨而已，这个她身份已经变了。因为就是那种“男主女从”，根据男性来去决定...

张：决定女性的身份。

李：身份。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很少发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去确定她的身份。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过去的那种婚嫁制度当中，是女性的权利真是，是完全被践踏掉的，就是在这方面。而且这个婚嫁制度，现在我们，我们现在的农村当中，那么被理所，理所当然，你妇女结婚了你就得嫁出去你就是泼出去的水。真的，那么根深蒂固，这种观念。我真是感到了这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女性主义研究当中，特别是社会性别当中它挖到它一些根子。过去我们老喊“男女平等”，但是我们始终对它根子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挖到的。它那两大根子，一个是性别分工，这一点我在，我觉得在西方的那种妇女研究当中就是被充分的意识到了；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婚嫁制度。这个在中国的农村的文化当中可以好好去挖掘它。甚至我就觉得，你看，包括我觉得我那个经历当中。你想，你没有，你没有结婚不能分房子，其实很多单位女的结婚也不能分房子，按男的去分房子的。那么，在这里，我要说，根子在哪里，也跟婚嫁发生联系。就是这个婚嫁的这种制度、这种观念，呃，包括这样一个根子在这里边。真是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它是深入到骨子里边去起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的话，都特别有必要的好好的去挖掘。

那么，想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婚嫁它不仅影响它的土地的一些

分配，它身份的一些确定，那么，包括教育。就是这一次，前一段时间到那个广，广东省，他们那个，给他们那个领导干部讲课的时候，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当时我就忽然间有一个感觉，因为一提到，常常人会说在中国农民素质低，女性素质低。而女性素质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文化素质。你一看到文化素质，哎哟，的确是。你看那个农村妇女当中才 59%上到小学的，那么，男的更多的他会上到中学。她就是要比他低。可是为什么低？一个是你国家的义务教育当中投入不够，你国家的责任你在推卸了。那么，家里边呢，他要考虑到我给谁投资更合适。好，这样倾向于男孩将来要养老。在中国，养老靠家庭，女孩子嫁出去了，靠男孩子养老，我自然我倾向于他投资。再一个性别分工。你性别分工当中的话，你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你将来反正做家务，照顾孩子嘛。所以从种种这些方面来说，它都倾向于给男孩子。实际上为什么女的这种文化程度低，实际上是把女性的一开始的义务教育最基本的权利剥夺的结果。所以，素质低是侵犯了女性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是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去看它的。这个权利不能保证而后边根子的东西是跟那个婚嫁制度发生了一种非常的，深刻的一种联系在里边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边的话，在中国啊，那两个根子的斩断特别的必要，而且和基本权利的保障。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觉得权利在中国真是，不仅...无论是从文化启蒙，民主政治来讲，都是公民社会，权利可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可能就是到整个的这方面的这种推进和发展呢，和现在的这种女性主义在这方

面，我觉得它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当然，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女性主义本身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和中国的整个民主政治和中国的这种公民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合力。这种合力呢，从女性主义本身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很多的那种男性学者，他们注意到了，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但是，他们对女性主义本身有着排斥，他们没有看到这里有很多是共通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局...我觉得局限性，而且是他们的一种不彻底性。那么，他要彻底的话，那么，女性的权利也同样应该是赋予的。那么，这个，由这个权利的那种概念，我觉得女性主义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东西，就是另外一个权力，就是力量的“力”的那个。就是它在揭示男女之间的关系上，他觉得根子上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我觉得社会性别理论当中一种非常深刻的东西。而这样的一种思想啊，在我们...我现在教学当中，我觉得还常常不被人们所认识。你常常你跟他讲的时候，噢，怎么怎么观点，但是他不会去用它。而且呢，他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很难去意识到这样一个层面。

我们的学生的作业一拿上来之后，比如说看那个什么来着，就是避孕是谁的责任。那么这时候呢，我就说，其实这方面的话男女有共同的责任。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女性的避孕率那么高，90%以上，男性那么低。你既然要有计划生育，你肯定要生了...有一个孩子之后，或两个孩子你就要避孕，那么这时候，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女性承担量是非常大的。那怎么去看这个问题？那么这时候常常会说，唉哟，男的恐怕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会认为男的没有这种知识，他认为可

能是一种阉割。当然，无知可能是那种因素。但是女的文化程度比他还低呀，她有这知识吗？很多人也没有这知识呀。那为什么女的还要再去承担呢？实际上它更深刻的是里边是什么东西在里边起作用？实际上就是说男的比女的更有权力，我可以去控制，而你是有更多的义务，我有更多的权力。所以，这个事的话，义务的事可能更多是交给你了。更深的东西是一种权力关系，是一种支配和控制关系。可是这一点，往往并不被所意识到。

我觉得这个，这个观点啊，如果能深刻地分析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现象，它对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现象是有颠覆性的。你会发现，噢，很多很多问题为什么会侵权，为什么一些人呢，光有权利没有责任，一些人有责任，没有权利。实际上人们对现实当中的权力关系背后这种东西实际上是没有意识的。而意识这一点太重要了。这时候你好好多东西你发现，我们，我们现在会强调市场经济那只手。哎，市场经济这只手的话呢，好，我这个地方挣钱多，你看垮垮很多民工跑到这个地方挣钱来了。那么这是一种支配力量，是靠着那个市场，靠着那个利润，靠着金钱。还有一种力量，实际上是一种，一种支配的力量。是有权力的一种力量，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有的时候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支配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在生活当中，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它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一个，你看，我们作为城市的妇女，是知识女性，我们不会有农村妇女的那样一种感受。因为我们还缺...我们背后没有那样的一种阶层当中所形成的一种权力的支配关系。当然我们还有地

域上的。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多，实际上背后都有一种权力的，而这种东西常常是隐含在背后的，常常不被人们去意识和发现的。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它又是非常起作用的。你还像有一些说法，我就琢磨一些说法。

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全国妇联开的一个会，那么这个会是跟《人民日报》合开的。《人民日报》的那个出版社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社长也来开了。当时呢，就是把这些座谈的内容想在人民日报上来发，就想影响媒体，把这个声音发出来。当时呢，就在这个内容的上面有一个标题，唉，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那么不舒服。就是说，“以地位求发展...以贡献求地位，以你的能力求发展”。（沉默片刻）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认...写的是一组写妇女的文章，噢，妇女现在地位低，那说明她的贡献低。你反过来颠倒看，噢，你的地位低，是因为你的贡献低。你贡献高，你地位不就高了吗？你的能力强你发展不就大了吗？这不在责备妇女吗？其实你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很多付出了很多，包括农村的妇女很多，但是得到却很少。那么有些人付出的少，得到的却多。是什么东西呢？是在分配这些资源的时候有一种权力，我能控制这个权力，我控制它我就可以使一些人劳动少也可以多得，一些人劳动多也可以少得。中国的农业被剥夺的情况不就是这种情况吗？他们付出的少吗？他们得到的也非常少，有一种...背后有一种权力--我可以控制这个资源--在起作用。这一层东西在里边，在我们中国这里边是非常起作用的。当然，在国外我觉得也有，也有。但是在中国更加起作用，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起作用。但是表面上，你

发现人们常会忽略了这一点。仅仅以为，噢，她得的少，你看，她素质差，素质提高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素质不能提高？你那个资源根本就不去给她，谁来控制这个资源，实际上就是这个权力关系在里边，在起作用。我觉得这里不仅仅是性别之间，性别当中的话，男控制女性，实际上在他背后还有一层一层的控制。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概念特别具有那种颠覆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些观念用到中国来，分析好多问题，可能还有会很多的那种独到的发现。所以，我倒觉得中国女性主义的那种...这个进一步的发展的前景，是可以把这些内容更深的用来去分析中国的很多现象。甚至可能在分析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些新的概念，形成一些新的框架。那么，在国外呢，我就注意到了有两类的那种学者，有一类就是说我注重去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发表论文，然后去影响人们的观念。还有一类呢，他把这些论文当中提炼出来，变成一些分析框架。像英国的有很多发展项目当中，特别注重这一点，这样的话呢，人们在运用它的时候，根据这些框架来去使用。

我觉得我们国家呢，就是说，在第二个环节上，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在这方面，一个是不断的挖掘生活当中的问题，一个是你应该提炼出来一些分析框架，能够使人们运用这些框架来分析问题。而且，真的，传统社会性别的东西无所不在。真的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要求你要有一种非常，不仅要有清理，而且要逐渐的在这些方面的话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说要做的事情还是非常的多。如果这方面的内容能够做的比较

深，比较透，那么，在国际互动当中，我觉得也是对国际女性主义发展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贡献，应该可以说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呢，我想下一步...你说作为个人啊，这个道路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从内心里我是认同女性主义的。所以呢，就是在中国这种女性主义，包括女权主义的提法，实际上中国女权主义变成女性主义这种提法本身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女权主义的那个环境并不好。(笑)它是把女权主义妖魔化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课堂，包括教学当中，包括培训当中，有必要给女权主义证明。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大的背景情况应该还是不错的。就是中国，我有一种感觉，我想我们正在经历着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这种社会模式向以人为本的那种社会模式的一种转变。包括，你看现在农民工的那种...退休金的那种，他在关注这些问题了。过去我们发展经济嘛，这些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现在就在关注，就是联系很多权利的问题，已经开始在提出来了，我想可能这个起步的过程，包括现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可能在一步一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对女性主义的发展空间会带来一些变化。而且女性主义也会在推动的模式转变当中做出它的一种特有的贡献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那种深刻的来去，用女性主义的，甚至更多的，我觉得可能不仅仅限于一种视角，可能应该是多视角的。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关注于社会性别东西特别多，而我现在呢，我觉得我在把它和其它的领域当中就是再变得更开阔一点。比如说社会政策，社会心理学，

社会工作，有很多的其它的点和社会性别同时放到一起来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更有利于...就是使社会性别的内容变得更丰富。

张：跨学科的，这样...

李：唉，对，一种跨学科的这种感觉，而不是仅仅就是我说我看社会性别跟其它的方面是分离的。那样的话你很难把一个东西谈透，就是说它生活本身那个内容的话，实际上它可能就是多学科的。就是说你有多学科的背景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问题看的更深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应该有一种跨学科的背景来去分析和认识问题。它不是，就像那个，我们看那个叫《超越社会性别》那个，伏尔德曼？她有一个，就是女作家的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的那个，就是社会性别的新疆界说。那么，那里边她就强调的是多重身份，多重视角来去看，甚至呢，当谈性别的时候你还要和它的阶层，多重身份结合起来。我觉得的这样的一种思路的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就是...但是你不能说把社会性别抛到一边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上来去看问题，分析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大力的传播它。真的，在中国，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行动的层面。那么，这样的一种传播，包括现在教学也好，参与式的培训也好，在这个方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仅仅是要把你的一种观念把它推出去，同时在这种互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噢，这个社会对这样的一种思想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反应？那么，这里边到底有哪些的难点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在过程当中来进行调整，啊，甚至去思考一些问题，

然后通过这种互动的过程来去传播。那么，这几年，我觉得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培训，真的是应该说这个收获是双向的。反过头来，你发现，它那里有很多问题，包括社会性别和男女平等，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因为男女平等是中国一直提的。噢，社会性别他觉得是西方的，实际上起步时男女平等过去也是西方过来的，仅仅是说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中国的了。实际上也还是这个...那么，你怎么去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这里边的确有很多问题值得分析。一个是呢，西方的男女平等指的是什么？一个是到我们中国之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你可以说是男女平等，但你也可以说是社会性别。那么，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是西方的东西。我觉得这真是一种狭隘和这方面的一种无知。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搞清，甚至，有些应该是结合一种背景来去看的。你看，那个...我觉得男女平等在我们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词我们谈的很多，权利也在谈。但是我们，几乎我们不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而且我们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来去看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男女平等，喊了半天男女平等，实际上是在工具化的角度上来看男人女人都一样。那么和现在在权利的基础上来看男女平等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两者之间里边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但是男女平等有它的局限性，有它的局限性。那么，社会性别呢，它把一些，这个很多不平等现象的根子的东西，我觉得它的那种挖掘，应该说它有它的非常独到和深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多的那种思考。

那么，这种思考...然后再考虑中国的国情。我觉得实际上中国人

和国外的人，因为他的国情不一样，在具体的策略上肯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候，它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带有共性的东西，不分国界的。所以呢，就在这种...我觉得观念上、在原则上，在一些基本的方法上都有共通性。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策略上，它恐怕会有差别性。特别是我觉得包括 95 世妇会，那时候在怀柔，北京的怀柔开这个会。江泽民总书记，居然在那里提到了，我们一贯坚持“男女平等”。(笑)你看，他在这个会议上讲出来的话呢，很有意思啊。他不是在我跟你国际上有什么对话，而是说我做得已经很好，我们一贯都在这样讲。这个情况就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就是属于，政府的主流的一种话语，是形成一种传统，他的一种认定。那么呢，社会性别本身呢，当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它的内涵。这两者之间我们可能看它那种差别是什么。甚至我觉得在策略上呢，我们有时讲的时候，可能是一种，用的是旧的一种说法，里边赋予着一些新的内涵。实际上这次我觉得到那个广东，他们让我讲的题目叫“怎么样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后来他们说这个跟社会性别怎么去讲，其实我觉得社会性别不能...不要把它看作概念，你要了解它的实质。你比如说它核心是权利问题，那么它里边有两个根本性的，一个是，就是社会性别结构性的东西，实际上在讲那个男女平等的时候，都可以把它，你可以赋予它新的内涵，给它讲进去。当然这一点我不知道，我觉得在西方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有个策略，但是我觉得策略你别变成一种排斥新的一种文化，而是你能够，就是说把一种旧有的，被主流官方所接受的话语

当中赋予它一种新的内涵。应该把这样一种观念给它讲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可能还应该，有很多的这种策略，可能需要考虑。这点我觉得不是妥协，否则的话，你很多内容做下来的话，它不是一下子你能够接受的。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把实质的东西一定要放进去，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性别的东西在中国实际上就被夭折了。要考虑策略。

张：那您在讲课当中，特别是在党政干部班当中讲这个，不管它叫男女平等也好，内容有，或者是策略方法上有社会性别，那么在这个课程过程当中有没有受到挑战？

李：应该说有。特别是那个什么来着...我们在中青班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谈到社会性别是什么，包括呢，这里边有一层它的目标：追求男女平等。他们说男女平等是什么，男女平等就是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嘛。他那理解当中，那么，他这时候就觉得中国男女平等妇女地位已经很高了。应该说常常会受到这样的挑战。那么，每出现一次这种挑战的话呢，好，我们就会根据他提出来的问题，来去反过来想，他是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再讲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有误解性的东西就可以给他去澄清。所以我觉得这次到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把对男女平等的诸多误解，(笑)因为这个称呼在中国那么多年了，误解非常多呀，包括那个男女都一样，体力都一样。这是非常荒唐的。那么，我们讲的根本不是这个含义上的，我说我权利平等，把权利平等直接给它提出来了。那么，怎么去理解权利，那么，权利平等在哪些方面有所体现。哪些是基本权利，哪些是发展权利。那么，

从这个角度去讲，它完全不是在原有的话语当中去赋予它的意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他们反而觉得，哟，这里边原来还有那么多的新意，有那么多多的文章是可以做的。让他跳出原来的那种思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挑战反而给你再去讲的时候，你又多了一层的那种，可以澄清的东西。你发现它的那种，那种误区到底在哪，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误区给它解开了。让他意识到，噢，它的本来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或者我们应该赋予它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挑战的过程应该，还是...也是一个不断的反思，撞击和提高自己的一个过程。

张：就我们所知，您是做这个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研究啊，比较这个关注这社会政策。那您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社会政策里边这个社会性别概念和它的这个主旨啊，纳入社会政策当中有哪些的难度？和现在所做到了什么程度？

李：要想把社会性别纳入到那个社会政策当中，我觉得，因为社会政策是由决策者做出来的。当然，就是说，在这方面的话呢，也可以去呼吁它，但是那个，也就是说决策者要有这种观念和意识，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又是他拍板的。而且特别是在中国啊，就是那种直接的，由妇女本身形成的压力集团，我觉得现在，这种大的条件并不具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决策者他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变得很重要了，变得很重要。当然，我觉得这一点完全不排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妇女组织，要通过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去影响她们，你这个东西出台

之后，你这个里边是忽略了妇女的利益或者侵犯了妇女的利益，我就要给你表达出来，同时我觉得还需要给大量的领导干部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培训。所以呢，现在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那种想法，呃，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不仅仅要进入到某一个学科里面去，应该在党校的那个领导干部那种培训当中，应该更广泛的进去。一开始就作为选修课，让更多人听到。然后呢，能够变成必修，那个现在就是等于在...我看广东推行力度还比较大。他们搞百讲，推动男女平等。

张：广东在，党校。广东省党...

李：广东省党校、妇联、组织部、宣传部四家合搞，就是“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百讲”的这种演讲启动仪式，也就是说要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要做到家喻户晓。

张：一百讲？

李：对，一百讲。那么，这一些呢，首先的对象都是真正的领导干部，就是说要把很大一股力量放到，让这些政府官员、决策者你要知道我们有那么样一个国策，而且这个国策当中有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呢，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按照国策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来去做。那么，这样的做法，我觉得现在就是不够在哪儿呢？仅仅是在全国...其实今年呢，是全国妇联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年，也就是说...

张：这是哪定的？这是哪定？

李：全国妇联定的。

张：全国妇联定的？

李：对。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应该在全国都要大力做这样一种宣

传。广东它那个台啊，你说你现在看的那个广东卫视节目，老是有个公益广告，“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个基本国策垮垮批下来了。

张：做的很好。

李：对，对它做的很好。

张：中央台没有啊？

李：是呀，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全国妇联怎么去推它，怎么推那个中组部。

张：这也是一个策略。

李：这里边，对，也有一个策略，也有一个他们那个...这个工作怎么去做啊。你要现在把这样一个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怎么让人发现，不是四项国策，而是五项国策。这事我们要怎么去做，如果这个宣传跟不上的话，你看那决策当中纳入性别意识就谈不到。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应该是很重要，另外一个，这里边还可以有很多的那种议案的提出。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使我们的国家是妇女有问题呀，从政府来说没有把它作为问题，但是呢，有些其它部分的问题呢，是跟妇女发生联系的问题出来就觉得是个问题。比如说那个，像，有一个问题，就是像那个，男女的那个婴儿出生性别比，现在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了。呃，达到了男是 118，女呢，是 100，就是官方数字。

因为不乐意要女孩儿嘛，他遗弃女孩儿。那么，这种情况变得差距大了。他们说，哟，这将来这男的要结婚怎么办哪，结不了婚了，一夫一妻制的基础被瓦解掉了。那么，他觉得是个问题了，这个问题

不解决的话呢，可能以后给社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但是一开始女孩子生命被扼杀掉了，没有把它视为问题呀。但是后来就怕，噢，万一这问题出来之后，很多的社会治安...

张：他的视角还是从男性的这个视角来，来解决你妇女问题的。就像“放足”一样的道理。

李：对，对。他是从男性视角，那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从男性的视角来去看这个问题了，那么，看这个问题可以顺着这个男性的视角他往后，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既然对他不好，那么，也就是说你保护了妇女的权利，你才能够使这种权利...情况减少。它是相互关联的。你把他引入到的那样一个方面去看。这一次，所以有一个代表就提出来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其中有一条，应该倡导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么，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紧接着就说我们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做到这一点。包括那个婚嫁制度，包括你那个村规民约当中，大量的侵犯妇女的那个基本的选择婚姻居住地的问题。那么，都应该去给它...都应该给它扼制掉的。所以呢，哎，在这个方面，是可以...就是在它的议案当中。

张：您刚才提到的参政女性的特殊问题，这是在您 95 世妇会以前就意识到了，那重新我们来反思这个中国女性参政问题，您觉得还有哪些的不同呢？跟您在接触女性主义之前的这种看法有哪些不同？

李：在这个接触之前，我可能是更多的是从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这方面来去看女性问题，看的更多一点。那么，接触到女性主义之后

呢，你就发现这个双重角色背后的东西，实际上跟那个性别的分工是发生联系的。可能在追溯根源的时候，就是它可以把这个根子上的东西揪出来。你会发现如果那个...而且很多的女性啊...女性的领导干部，你过去就觉得你会特别的同情她，你会觉得这个情况的话呢，给她的压力太大了。那么，就说你现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我们可能应该是从很多的，后面那个性别分工的那个角度上来去解决问题。不仅仅是她个人问题，而是我们社会当中一种观念，甚至包括一种政策要怎样要进一步调整。你比如说，而且这些...再看这些女性的时候呢，你不仅仅是同情，你会发现，她也真是既现代又传统，就是表现出来的非常的矛盾。从挑战很多的传统观念来看，性别分工来看，她有她现代的一面，同时呢，实际上很多的领导干部权利意识是非常薄弱的。我们讲究这个权利问题，权利意识是很薄弱的，还有很多人还是那种听话的那种。当然，可能在这个位置上有许多领导干部所难言的那样的一种苦衷啊，背后还有一种职业上的那种要求在里边。那个，此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又传统又现代。但她们往往会被这个性别分工的东西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很不彻底的一面，她们就觉得你不仅要做一个现代的这种、这种领导，这种挑战传统才能成功，同时你还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总而言之，传统的很多东西她们是认同的，这样的话，也给她们自己内心带来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比如说怎么样才能从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解脱出来，能够变得潇洒一点，能够对传统的东西有一个比较彻底的挑战。这些方面都很不够。我觉得可能这里头的问题可能还要多的多。而且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仅仅看到她们本身，而且你发现有很多她们本身表现出来的东西的话，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的制度，实际上是认同的，它是体现在很多很多的方面，你就不认为是在改变她们的观念，不仅仅是改变她们的一些观念，而是和改变我们社会上的很多的制度，很多的政策，甚至很多的那种习俗，会发生一种联系。

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社会性别呢，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很有挑战性的。它不仅仅真是，你的眼光，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它是对你很多生活当中各个方面的东西，根本性的东西，它都要有一种颠覆。所以就是说你在追求它的时候呢，你会感到难度更大，就是推进上难度更大。但是如果不做这个的话，有好多的情况会发现，你是“雨过地皮湿”，不能改变根本性的东西。实际上中国的男女平等走过了这么多年，你发现有很多为什么没有改变，它根子就没有被触动，所以不触动，它就不可能改变。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上，就是说，就是这个，我觉得社会性别的确可以...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它可以变得使你更深刻，使你发现在这里有很多的根子要触动。当然它的难度就更大，但是恐怕必须要这样走，否则的话，我们的历史你发现，老是在...为什么现在传统的性别观念那么能回潮，真是不得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根子没有触动，而且是现在很多女孩，她会认为传统的东西恢复是一种时髦，历史很多都被割断了。所以我到，更感到，我觉得我们推行这种社会性别，传播这种观念意识的一种必要。

张：还有使命感？

李：是这种感觉，而且现在是这种感觉，真可以是一种使命感。

这个，你就感到，哦，人这样活着的话呢，你会感到你有一种，有一种东西在支撑着你。好像跟作为一种职业，把老师作为一种职业，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挺好，我觉得，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感觉挺好。(笑)有时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说...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问谁是“女权主义者”，没有人举手。因为你们去界定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在中国，我觉得就被妖魔化了，可是在国际上也有这种情况，在中国就更加如此。好像就觉得你是在打倒男人，你把男人作为对立面，我觉得这种看法真是...也就是跟社会性别，被人了解太有限有关系。

张：那您觉得您是吗？

李：啊，我...如果在那个含义上，如果说你是...我是在追求女性的权利，同时我是在追求所有人的权利，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忽略女性权利，女性权利也应该给予维护。我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是。那么，那个，而且我是追求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妖魔化的，是一种压迫男人的，是一种以男人为敌的，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不是。当然，其实另一种，把女性主义妖魔化，我觉得那种观念是把女权主义妖魔化，它完全不是女权主义的本义。女权主义的本义在我们国家当中，我就应得被了解的情况还是，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女权主义，因为我了解它，所以我觉得在内心，我认同这点毫无问题。那么在中国就是你当对别人说的时候，当人说你女权主义就是要打倒男人的时候，那么可能你首先要澄清，我在这里谈的是什么，然后我个人主张是什么。但是能不能有那么多的机会人家让你说那么多。

(笑)

张：非常感谢。